

## 一、前言

不同於台灣僧侶的食齋、戒女色的刻板印象，日本多數教派的僧侶可以飲酒、食肉、娶妻生子，日本三條市甚至曾舉辦過「年輕和尚相親會」，參加者包括 30 位 40 歲以下的和尚與二十餘位女性，最後並結成八對佳偶（〈穩定不花心和和尚成爲日本女性最理想對象〉，2013；Mulove 2013）。儘管在日本，和尚食肉、娶妻已經變得稀鬆平常，<sup>1</sup>但直至 1900 年代爲止，即便明治初期國家已解禁食肉、娶妻，日本佛教<sup>2</sup>各宗多仍維持此戒律。

明治政府成立之後，透過去除身分制度、兵役制度、戶籍制等一連串政策，嘗試將生活在這地理空間中的人們轉變爲均一化的國民。在這過程中，原本位於士農工商此常民階層之外的僧侶也被劃歸至國民的範疇，「肉食妻帶」（食肉、娶妻生子）禁令的解除可被視爲是這一連串使之「國民化」的最重要政策之一。日本佛教是從中國、朝鮮傳入的大乘佛教，根據其教義不可娶妻生子、食肉，但日本僧侶於 1872 年首先由政府下令解禁，其次於 1900 年代各宗陸續解禁，於今與中國、朝鮮等大乘佛教盛行地區的僧侶不同，多數宗派認可娶妻與食肉。倘若娶妻與食肉作爲區別僧侶與常人的重要依據，於明治初期政府宣告解禁之際，仍持反對意見的日本佛教各宗派，何以在日後陸續宣布解禁？在這過程中又如何維持自己與常人的區隔、維繫作爲僧侶的自我認同？

本研究認爲，除了日本明治政府有意識地將佛教降低爲次於國家神道的一般宗教促使僧侶成爲等質的國民一員之外，自幕府末期即遭受

---

<sup>1</sup> 例如曾連續 4 年參加日本紅白歌合戰的日本知名樂團 FUNKY MONKEY BABYS 的解散原因即是當中的一員在婚後決定繼承寺廟，成爲住持。

<sup>2</sup> 「佛教」這用法源於明治時期，在此之前並不存在「佛教」，而是佛家、佛法、佛道。現在日本社會中佛教隸屬於宗教之內，但在日本歷史上，原本「宗教」是隸屬於佛教。

「佛教無用論」抨擊，於明治時期在社會、經濟地位上更遭受根本性動搖的佛教各宗，嘗試化出世為「入世」，積極參與社會並透過回應同時代逐漸強化的國家主義以求自保、護教，「肉食妻帶」戒律的解禁乃是成為當中之重要象徵。但這解除戒律的過程並非平順無波，在「肉食妻帶」禁令作為長期以來維繫僧侶自我認同的戒律，並作為俗人或常民辨識僧侶的主要特質之下，廢除「肉食妻帶」戒律可能導致僧侶由身分轉變為職業，即如同理髮師、廚師等其他職業般，教義與各種儀式成為如同前述職業的剪刀、鍋鏟般的營生工具。對於如何避免陷入「職業化」的窘境、如何維持與常民的身分區隔，在僧侶之中出現圍繞著解除禁令與否的爭執與分裂。

所謂的「國民化」並不只是國家意識形態作用下的結果，在廢除社會等級制度下，個人開始意識到自身作為國民一員的權利與義務，並在這過程中嘗試藉由回應時代對於「國民」的期望以消除對自身歧視，提升自我地位。本研究並非討論日本佛教各宗派宗規內容與變遷的宗教學式論文，而是嘗試以當時國家主義逐漸高漲時代為背景，透過分析作為行動者的佛教僧侶面對佛教勢微壓力下所採取不同策略，解答沿襲大乘佛教教義而禁止肉食的日本僧侶何以會於 1900 年代起陸續解除肉食禁令。

## 二、文獻回顧

「肉食」與「妻帶」被聯繫成為一組概念可追溯至元祿時期(1688～1703)的真宗教派。所謂的「肉食妻帶」原本實際上是其他教派對真宗「女犯肉食」的嘲諷與批判，但真宗學僧重新將之詮釋為「肉食妻帶」以區辨於其他教派的批判，並賦予正當性。之所以會在元祿時期於真宗學僧著作中大量出現以〈肉食妻帶××〉或〈持妻肉食××〉為題的文章，是因為當時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生物憐憫令」下嚴格禁止狩獵、食